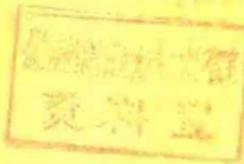


送文稿

建阳文史資料

13·7

存根



第七輯



建阳文史资料

第七辑

编 稿 政协建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组
印 刷 福 建 省 建 阳 印 刷 厂

一九八七年十月

(内 部 资 料)

目 录

暨南大学在建阳情景	白 文 (1)
民国时期建阳民政	蔡古初 (10)
北伐军路经水吉街始末	陈 平 (14)
民国时期的水吉报刊	洪云汉 (16)
抗战时期的“民力”周刊	陈受恩 (18)
独立第三十三旅闽北战地青年训练班	章子祥 (20)
民国建阳几家大商店的兴衰	张世民 (22)
张 钧	陈明考 (27)
周一鶴先生事略	刘春来 (31)
建阳林业梗概	文梅荣 (35)
建阳造纸古今谈	杨水心 黄寿恩 (47)
解放初期 建阳城镇建设	张永胜 <u>徐洪钧</u> (50)
桥南小学“文革”前十年教学工作纪实	沈小妹 (56)
建阳公路简述	许道和 (66)
福建省建阳汽车修配厂沿革	胡武升 (69)
建阳卫生事业回忆	陈远智 (77)
百年成药“刘朝阳 神油”	刘炳华 (80)
建阳县档案馆简介	曾晓明 (82)

- 建阳县馆藏文物选介(下) 谢道华 王治平(85)
僧惠崇的画与诗 李加林(93)
朱熹与建阳刻书 方彦寿(96)
朱熹的书法艺术 刘 建(99)
来函照登 陈 平(108)
照片：建阳县文化馆馆藏文物 谢道华摄(封二、封三)

暨南大学在建阳的情景

白 文

1941年初，经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核准，在福建筹设暨大分校。1941年夏，暨大特派商学院院长周宪文，训导长吴修等，前往福建筹建暨大分校，选定了闽北建阳童游乡之文庙为分校校址，作为以后学校南迁的基地。

建阳分校由周宪文教授任主任，中文系许杰教授兼任注册科主任，分校于同年11月正式开学，招考文、理、商三院9系一年级新生240人。

由于日军侵略扩张日益蔓延，形势更为紧张，上海“孤岛”办学，难以支持。暨大为图存发展，于1942年一月起，陆续组织教职员和学生分批南迁，沿途敌机轰炸，南迁师生历尽艰险困苦，难以用笔墨一一记述。

1942年6月暨大迁闽完毕，建阳分校名义取消，暨大和东南联大暂时并校上课。1942年秋，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指令停办东南联大。

1944年5月12日，国民党行政院准将东南联大的文、理、商三院并入暨大，其他并入英士大学。关于暨大在建阳的情景从四个方面分述如下：

一、山乡环境与简易校舍

建阳县号称潭城，虽是闽北偏僻的山区小县，当时县城人口不足万数，但它却是闽北公路交通的枢纽，抗战以来已成为重镇要地。建阳北面公路是通往沪、杭的交通要道，南面与福建战时省会永安相衔接，建阳位于闽北万山丛中，山势险峻，日军虽在浙赣铁路沿线活动，但始终无法进入腹地，所以东南半壁江山，得以保全，少受敌军骚扰。

建阳经济文化不发达，物资缺乏，抗战中骤然搬来两所大学，已成“道大莫容”，而浙东战事西延上饶，南抵仙霞岭后，浙东各军政机关亦均退匿于此，更是人满为患，学校只有借住小学，改造祠庙，租用民房，辟草菜，斩荆棘，筚路兰缕，历尽艰难困苦，始得容身之地。暨大迁此，固然可以在不受敌人直接威胁下继续办学，但仍不免受到战时环境的影响，处于警报频鸣，人心惶惶，经济困难，疾病丛生的境遇之中。

当时暨大校址以文庙为中心，位于县城的东郊，与县城仅隔一条崇阳溪，架有木桥相通，山洪暴涨时，木桥常被冲垮，只能乘船渡过。

文庙位于崇阳溪侧畔，文庙即学宫，是一座古式大庙宇，宫墙万仞，雕梁画栋，古代建筑艺术给人庄严肃穆之感。宫前大道一座高大牌坊上，嵌上“声教南暨”四个大字，颇为壮观，宫内前庭种有金桂、银桂两棵，树龄造百，高可十寻，春夏时令，绿叶扶疏，凉意习习，仲秋季节，花气溢扬，十里飘香。

文庙经过一番修葺粉刷，改装门窗，面貌焕然一新，红柱白垩，

飞檐斗角。大成殿扩建后作为大礼堂，大殿两侧东西庑廊几列厢房，改建成教室、办公室以及宿舍等。明伦堂及附属廊阁，改建成教室10余间。正后殿作为图书阅览室，崇圣祠改装为图书馆，并修女生宿舍一座。各院系的教室、办公室、学生餐厅，一部份单身教职员宿舍，都设在这里，千余莘莘学子，于此弦歌不辍。

除校本部文庙是古建筑群外，其它大多数校舍都是茅草屋顶，土木结构的战时简易建筑。在文庙北面童游乡东郊建造了教职员宿舍4幢，童游乡北郊修葺祠堂书院6处，新建学生宿舍五幢，浴室10间，大饭厅一座。此外，还装修董家祠、杨家祠、袁家祠、忠烈祠、三圣庙、中山室、起春庵及民房数十处，作为男生宿舍、教职员住宅、医院、疗养室、体育部等之用。同时还开辟修建自校门至建浦公路，学校后门至教职员宿舍，文庙至学生宿舍的马路3条，开辟体育场地100余亩。

教职员和学生住得比较分散。除女生宿舍和教职员单身宿舍在校本部外，其余都在校外。男生住祠堂、古庙和简易茅屋，离学校较远，步行到学校费时约20分钟，带眷属的教职员小部份散居在童游乡，大部份教职员住在学校新建的新茅屋宿舍内。宿舍坐落在学校后西，横过一条公路，约步行十余分钟可到。新盖茅屋顶用一层很厚的稻草作盖，就地取材，省工节料。每单元设一房一厅，厅在前西，卧房在后西，厅的前面，就是公共走廊。走廊较宽，是各家烧菜煮饭的地方，一个炭炉，一口锅，饮食问题，便这样解决，生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1941年分校开学时，学生仅240人，教职员十余人，1942年学校全部迁来后，学生人数增加一倍多，教职员增加三倍

多，此后每年都有扩充，至1946年夏，学生已达一千三百余人，教员共80余人，职员70余人，工警130余人，建阳时期有毕业生五届，557人。

二、战时体制与简陋设备

学校南迁建阳后，为适应战时环境和根据经费等条件，在体制上实行紧缩，教职工人数骤减。尤其行政机构的工作人员仅剩数十人。

学校设办公室、教务处、总务处、训导处等教学行政办事机构，先后聘请了杜佐周、孙怀仁、许杰、沈练之、盛叙功、俞剑华、吴修等分别担任秘书、教务长、总务长及训导长等职，协助校长主持各部门工作。

院系设置仍为三院九系：文学院下设中文、外文、教育、史地等四个学系；理学院下设数理、化学等二个系；商学院下设会计银行、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等三个学系，此外还设立南洋研究馆。

在建阳初期，图书资料非常缺乏，只要能够上得了课，大家挤得下，就不错了。后来逐步向江山、南平、福州等处商务印书馆搜集购买到少数书籍，还特派郭虚中驻福州专职搜集采购图书，经多方努力，才先后购得中文图书数千册，其中还有不少善本。另蒙在福州的外国朋友惠赠外文书数百册。经数年经营，图书馆略具规模。

图书数量少，而仪器更少，理学院学生平时上课除记笔记外，无法做实验。后经校方向设在邵武的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求援，方能做些实验。

三、教授阵容与学术风气

学校南迁建阳，也并非理想之地，尤其交通困难，山乡贫穷，供

应紧张，生活艰苦，这就给延聘教授增添了许多不利因素。但学校崇尚开明办学，自由研究，以及何炳松校长的学者风度，吸引了许多著名学者到暨大来任教，使教师阵容大为加强。历经四年延揽，至复员前，所聘教授已达百人，成为东南各大学之冠。他们来自全国各地；而以江浙地区的居多。当时暨大的师资队伍，名家荟萃，人才济济。如：周予同、王子瑜、周宪文等均为当时教育部大学丛书编纂委员会委员，杜佐周是教育学家，后出任英士大学校长。胡寄南为心理学家，曾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孙怀仁为财经学家，后出任上海商学院院长等。

学校许多教授所教课程，对学生教育影响颇大。如胡寄南讲授的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孙怀仁的经济学、财政学；方光焘的文学批评、文学概论、日文；盛叙功的地质学；许杰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沈练之的法文以及卓如的经济思想史；卢怀道和陈振铣的会计学；邢文铎的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王秀南的中等教育、普通教学法、教育学科教材及教法；陈文彬的法学通论；吴裕后的国际贸易、关税政策、人事管理；苏乾英的南洋概论等等。均受到学生的欢迎和好评。

学校还聘请外地知名学者来校讲学，如浙江大学李培恩校长开设的国际经营专题讲座。上海中央银行陈行长讲授金融学一个学期，听者踊跃，备受欢迎。1944年秋，厦门大学王亚南博士开设的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讲座，座无虚席，有的老教授也冒着刺骨寒风前来听讲。

建阳时期虽然侨生不多，但仍坚持开设南洋概论。商学院还设有南洋商史及法规一课。一年级学生开设南洋概论，不计学分，但人人

必修。南洋商史及法规为三年级所学的专业课之一，有4个学分。教育学科教材及教法，因停开已久，来补选听课的学生特别多。

同时，坚持传统，注重用英语教学，促进了学生外语程度的提高。

何校长实行自由研究的学术方针，力主各种学术主张、流派、科研方法互相观摩，共同繁荣。提倡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与西方先进文明共处发展，互相促进，使全校尊师重道，自由研究，蔚然成风。各种学会，学术团体，文艺社团组织，犹如雨后春笋般遍布校园。学生可以自行选择，自由参加。

王亚南讲中国经济问题自成一派，他的讲稿，不久整理成一本专著，名为“中国经济原论”，曾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教授卢怀道和助教王哲镜合译“会计学”一书，和许炳汉教授所译印度薛费著的“财政学”一书，均公开出版，后者还列为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之一。

许多学术团体中最有影响的有学林社、大白社、来明社、求知会、史地学会、经济学会、新闻学会、京剧团、话剧团、歌咏团等。一些教授乐意担任学术团体的指导。许多团体常邀请教授作学术报告，如经济学会聘请卓如为指导，王亚南来校讲学时，还曾对该学会进行指导。学术团体的活动方式各异，有的以自学为主，辅以小组讨论和听学术报告，认认真真地读几本书，有的则组织会员自己找书看，定期交流读书心得。各学术团体还创办了许多小报、壁报。

整座文庙，学会林立，壁报争鸣，戏剧社与歌咏团相映生辉，学术活动频繁，自由研究成风，使战时的教育阵地上充满生机与活力。值得记述的是，当时暨大各社团组织实行了大联合，于1945年下半年成立了各学会壁报联合会，简称壁联会。壁联会由下列25个社

团会员联合组成：

学林社、太白文艺社、中国文学研究会、暨大青年未明文艺社、励学社、诀风诗社、史地学会、教育学会、经济学会、英国语文学会、新闻学会、1946级会、华侨同学会、女同学会、百粤同学会、瓯海同学会、江淮同学会、庐山同学会、泉永漳龙同学会、六睦学友会、衢中学友会、蕺山校友会、集美校友会、安定学友会等。壁联会所辖刊物有“微茫”、“学林”、“诗垦地”、“艺苑”、“太白”、“未明”、“文艺”、“暨大青年”、“时与空”、“新闻周报”、“改造”、“铎声”、“1946级”、“南侨”、“女声”、“南星”、“人言”、“格非”、“诀风”、“六睦通讯”、“驼铃”、“蕺山”、“南青”、“大江”、“天马”、“庐山”等。

壁联会聘请的顾问有沈炼之、方光焘、阜如、王勤靖、陆伦章、陈文彬、戚叔含、俞剑华等18人，壁联会的负责人为：郑英杰、金尧如、傅春龄、兰文灿等。

壁联会还作有会歌，其歌词为“拉起手来，同学们，在民主的旗帜下，我们合力工作，齐声歌唱、齐声歌唱。我们在斗争中生长，谁要压迫我们，他一定灭亡！拉起手来，同学！拉起手来啊！同学们！挺起胸膛，挺起胸膛，走向前去！阳光照亮了我们的队伍，看吧！前面展开了新社会的康庄。”

新闻学会的一些活动分子，把“南风”墙报办成日报，天天用毛边纸手抄后张贴。

暨太剧社于1945年改造后，蔡启鸿当选为社长，他同杜梦余、李碧依、张同修等同学共同主持社务，为1945年校庆和纪念何校长主政十年举办一次盛大庆祝活动，上演“桃李春风”，歌颂在

战乱年代中一位老教育工作者与学生的师生情谊。剧社曾先后演出过“雷雨”、“白玫瑰”等大型话剧，以及“醉生梦死”、“长夜行”“未登记的同志”、“晚祷”等剧。为慰劳前方抗敌将士举行过义演。还义演“雷雨”为救济从战区撤退的学生筹措基金，场场满座，建阳日报还刊登剧评，表示赞许。后来蔡启鸿、陈默等同学成为专业演员和导演，蜚声艺坛。

暨大歌咏团，团长为陈默，曾公开演出“黄河大合唱”等节目。参加歌咏团的同学，每周练唱一次，熟悉世界名歌百首，以及俄国名曲、夏威夷民歌、美国电影插曲等。“空山鸟语”成了管弦乐队的热门和保留节目。他们积极宣传群众，鼓舞群众，为抗日爱国斗争服务，也丰富了师生的生活。

四、清苦生活与乐观精神

建阳本为粮产区，但因学校机关迁入日益增多，人口猛增，造成粮食恐慌。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所拨经费，不能按时到校，造成经济的困难，后改由县政府发给公米，才有所缓解。

闽北山地，本多疾疫，疟疾、烂脚尤为流行。生病人多，而医疗人员、设备、药品严重不足，患者所受威胁尤甚。经添聘医生护士，购置药品后有所改善。同时向中国红十字会，青年会救济总会及地方军政机关呼吁救济，组织建阳学生救济分会，竭立救济贫病学生。

战时师生的生活是清苦的。学生一日三餐，多以黄豆、咸菜、竹笋佐食，每月加几次菜，尝尝肉的味道。衣着极为朴素，甚至近乎褴褛。

师生的住宿条件也很差，住得很挤，每室 6—10 人。晚上自修照

明，开始是用桐油灯，1—2人合点一盏，后改为煤气灯。

有些清苦学生，在学期间得到学校领导、教师和同学的资助，才能坚持完成几年的学业。有的不仅靠学校的资金、助学金，还实行工读，一边读一边工作。如到暨南教工子女补习学校担任一些教学工作，获得一些报酬，维持生活基本费用。后来争取到较多的奖学金、助学金名额，解决了学生生活的困难。

生活虽然清苦，但师生们精神上是乐观的，积极的，教师专心教学，学生潜心研读。师生在一起，相处融洽。他们苦中作乐，当年有一教授还给一间学生宿舍命名为“旭庐”，并亲书一横幅，鼓励同学要像旭日东升那样，努力向上。

几十年后，当年学子尚回忆说：四、五年的建阳生活，大家在缺乏现代物资供应下度日，而不觉其苦，医药设备很差，但病痛不多；敌寇侵袭消息频传，而不感恐慌，警察虽无，而治安绝佳。这段生活是值得回味的。

1945年8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捷报飞来，全校欢腾。抗战胜利后，南迁闽北的暨南大学，立即着手组织成立迁校计划委员会，筹划迁校复员回上海。

1946年春，学校提前期终考试，放了暑假，于四月开始复员，组织回沪的搬迁工作，历时两月，于六月全校迁沪完毕。1946年10月学生到沪恢复上课。至此暨南大学结束了在建阳先后历五年的办学生活。建阳也从此消失了高等学府。

（本文材料摘自暨南校史）

民国时期建阳民政

蔡古初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县治机构人员随驻军而左右，极不稳定。访问老前辈亦很难具体叙述。大约是1915年，省下设道，建阳属延平道。县设县公署，改知县称为知事，分科室掌事，置科长、科员、事务员等职。但这仅是名称的变换，实际人员还是原有三班六房和师爷们沿袭下来。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北伐军过境，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六师留守建阳，才开始推行新县制。1927年改建阳县公署为建阳县政府，改知事为县长，新县长黄定。以后几年，县治机构逐步完善。当时主要设三科，第一科掌民政、建设，第二科掌财改、总务，第三科掌文化教育。虽说机构逐步完善，但军阀当权，各地驻军自行其政，大开烟、赌、妓歪风，社会一片乌烟瘴气。1933年推行新生活，才把军阀祸害社会的“开放烟、赌、妓三禁”革除。

1934年陈仪任省政府主席时，创办县政人员训练所，用招考训练方法招收县政人员，受训期满后由省政府任命，统一分配使用，县长无权任免，也无权调动。这一措施杜绝了以往新县长携带一批私人走马上任和地方豪绅把持乡曲的弊病。

自此，县政细胞有所更新，一批批学生出身的青年代替了旧吏之治。1936年，省府下文取消原来自治性质的区公所，改

行县政府分区设署，区署是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区署设区长一人，区员二至五人（视区的大小而定），区员兼巡官一人，事务员一至二人，录事一至二人。我县共设四个区署，分别设于城关、将口、麻沙、徐市。区长有指挥、监督辖内军政大权，类同过去的分县。

分区设署之后，民政统治功能加强，人民自由受到更多的限制。例如发“良民证”，举办五家联保连坐切结等。

办好户籍登记是庶政之母。当时户籍登记有十项内容，为结婚、离婚、出生、继承、认领、收养、监护、设籍、死亡和死亡宣告等十种。户籍资料，可作各项工作的施政依据，对工农业生产，社会建设应兴办什么？革除什么？都能有的放矢，不至盲目进行。从表面看，办好户政是件好事，但仍由于吏治腐朽，乡治尤糟，加上农村星散，交通不便，经办人员懒于过问，对户籍报也罢，不报也罢。后来加上征兵的弊病，壮丁入伍受虐苦，新兵未到战场，先被折磨致死。因之说到“征兵”，谈虎色变。适龄壮丁，外逃、藏匿，户籍登记弄虚作假，新生婴儿以男报女，甚至行贿作弊，涂改性别，男变成女冒名顶替，死而复生等等现象，无奇不有，户籍十分紊乱。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县政府社会工作从民政科析出部份主掌职权，成立社会科。社会科工作范围主要管理人民团体，如同乡会、商会、农会、各同业公会，社会文化教育以及社会救济、军属优抚等，但实际上日常工作不多。

社会救济方面办了一所救济院，收容难民。院长朱其修，院址设在马祖庙（又名天后宫）即今县人民政府宿舍对面。院址不大，以庙殿厅下廊边走廊为宿舍，十分简陋。收容人数多则三十余人，少则十几人，其中不少是街上要饭的叫花子。被收容者的生活本已极苦，可是

口粮还得被扣，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

社会救济除了一所救济院之外，还对外地人无资返回家乡的，发放一些旅途救济金。金额十分微少，凭路条证明，在证明条上批明已发救济费多少，再到邻县时另由邻县核发。具体发放数大约仅敷甲县到乙县的车旅费。

军属优抚，也是一种救济。春节前夕，按军事科开出的军属名册发放。在货币贬值的状况下，军属领到的优抚费有时只能买一、二斤猪肉。

对同乡会、商会、同业公会则说不上什么管理，只是在这些群众团体改选理事会时，社会科科长、科员应邀前去开会，会毕饮宴，醉饱而归。

当时剧院演戏，每天要把演出的戏名上报，社会科人员有若干本检查证，每天晚上可以凭检查证去戏院检查，检查所谓有无伤风败俗的污秽内容。其实经办人员趁机趾高气扬地看白戏。

1943年（民三十二年），县长邹仲融推行四大保政。内容是保设公田、保立学校、保有警察、保有干事。

（1）保设公田：开垦稻田若干亩，由各户合力耕种，其收成归保公有，作为办学基金。

（2）保立学校：由保公田收入，作开办学校教员工资和教学费用，每保必须办一所学校。

（3）保有警察：每保推选一个办事公正的人，业余时间担任地方治安事务，并协助征兵（抓壮丁）酌给补贴。

（4）保有干事：协助保长工作，酌给补贴。四大保政看来其动机是欲以保为基础刷新民政。但实际上除了保立学校，使建阳增加了

不少学校，尤其是僻远的村庄也出现了学校是一件好事之外，保设公田，徒有虚名，多数的保，阳奉阴违未闢公田，而是以派款代替合耕，这就给农民，尤其是贫苦人民增加了一项苛重的负担。保警察、保干事则不少是一些游手好闲的浪荡子担任，其中一些保警、保干事趁机欺压百姓，无所事时，摇摇摆摆，穿村串户，干出伤风败俗的勾当。而真正该管的事却无人过问。这和推行四大保政本意不符的事实，是当时社会背景所决定的。邹仲融为了推行四大保政而办《大潭报》，以这个报纸为四大保政作宣传。《大潭报》在当时的建阳县报来说，还是比较像样的报纸，社长江涛颇有正气。《大潭报》对当时抗日宣传相当有力。

1945年，邹仲融调离建阳，继任县长张之觉，到任不久就裁去国民学校42所，淘汰教员33人，变原来一保一校为二保一校。国民学校裁去之后，养校保公田仍然存在，甚至每保要增闢公田20亩。《大潭报》不久也随之消失。

随着时代的浪潮，要求民主呼声日高，1943年撤消了区署，各乡（镇）直属县领导，全县设十七个乡（镇），即景贤、（城关）童游、彭墩、将口、崇雒、后畲、回瑶、徐市、大阐、营口、后山、麻沙、书坊、茶布、界首、长坪、黄坑。

同时国民党实行地方自治。所谓“地方自治”，是指由百姓选出代表，成立“民意”机关来监督政权机关的施政。选举由下而上进行，乡（镇）以保为基础，各保的选举，名为召开保民大会，实行全民选举。实际上都由保长把持，因为当时农村中绝大多数是文盲，选票画圈圈时，则由保长指定专人代笔，等于包办代替，这种选举所以当时被人称之为强奸民意，乡（镇）民代表的选举，以保为单位，每